

· 重大基本理论问题研究 (十八) ·

透视技术霸权主义

——技术结构性“返祖”现象的特征与本质

张亮¹ 陈寒醒²

【内容摘要】 当下，西方左翼思想界逐渐摒弃了冷战后兴起的技术乐观主义，转而聚焦技术霸权主义的结构现实演变，发现其存在从自由流动到“数字圈地”、从攫取利润到收取“数字地租”、从平等自由主体到“数字依附”、从市场化到国家干预、从全球市场到平行市场等五种“返祖”现象。这些现象并非简单意义上的历史回归，而是在数字技术赋能下，金融资本对传统生产要素进行现代意义上的功能性重组，反映出其在数字时代所呈现出的封建式积累特征及其内在的脆弱性。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全球技术秩序正在重组与变化，垄断本身逐渐成为霸权体系的薄弱环节，这也为其他国家参与全球技术治理、重塑技术格局提供了新的战略机遇。

【关键词】 技术霸权主义 技术封建主义 “返祖”现象 数字技术 金融资本

【作者】 1 张亮，南京大学哲学学院院长、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2 陈寒醒，南京大学哲学学院博士研究生。（南京 210000）

近年来，一向标榜自由市场和自由贸易理念的美国改弦易辙，大搞技术霸权主义，将经济问题过度政治化和安全化，破坏了世界自由贸易规则。伊万·费根鲍姆（Evan A. Feigenbaum）、亚当·西格尔（Adam Segal）等美国国际关系学者选择 20 世纪 80 年代的“技术民族主义”这一旧术语来命名这种现象。他们认为所谓的“技术民族主义”是将技术发展与国家的主权安全、未来发展以及地缘政治等高度融合的战略。^①雅尼斯·瓦鲁法基斯（Yanis Varoufakis）、塞德里克·迪朗（Cédric Durand）等欧洲左翼学者从资本主义批判的角度出发，称之为“技术封建主义”，主要强调其与平台资本结合的接口规则具有封闭性，以及在数字地租、数字农奴等维度展现出来的向封

① Evan A. Feigenbaum, “In Asia, Disruptive Technonationalism Returns,” *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 November 13, 2019; Tobias Feakin and Adam Segal, “Brave New Technonationalist World,” *Foreign Policy*, June 4, 2025.



① Yanis Varoufakis, *Technofeudalism: What Killed Capitalism*, London: Bodley Head, 2023; New York: Melville House, 2024; Cédric Durand, *How Silicon Valley Unleashed Technofeudalism: The Making of the Digital Economy*, David Broder trans., London and New York: Verso, 2024.

② Richard Barbrook, "Cyber-Communism: How the Americans are Superseding Capitalism in Cyberspace," *Science as Culture*, vol.9, no.1, 2000, pp.5-40.

③《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4页。

④ 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田禾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1年,第18页。

⑤ Michael Hardt and Antonio Negri, *Commonwealth*, Cambridge, MA: 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Preface, pp. viii, x.

建主义退化的逻辑。^①透过上述新视角,我们确实看到技术霸权主义存在诸多向新自由主义时代之前回归的“返祖”现象。但这并不意味着历史发展进程出现了倒退,而是表明资本中“古老”的掠夺性因素正在重新发挥作用,金融垄断资本正利用技术上的垄断地位来维护其不再稳固的霸权地位。虽然目前金融资本并没有形成稳定的生产关系来驾驭生产力,但资本扩张垄断逻辑与技术开放创新逻辑的内在矛盾不断激化,这可能会引发世界技术格局的变化。

西方左翼理论界重新聚焦技术霸权主义的原因

冷战结束后,西方左翼理论界在批判资本主义时,比较关注政治霸权、军事霸权、经济霸权及文化霸权,很少触及技术霸权。这种局面在美国总统特朗普第一任期开始后逐渐改变。此前,西方左翼一度乐观地认为,新技术的发展将推动人类社会进入一个世界一体化水平更高、国家间差距日益缩小的更好状态。有欧洲左翼理论家甚至乐观地预言,新世界的曙光已经开始显现,“数字资本主义”之后将是“数字社会主义”“数字共产主义”。^②但这一乐观预言落空了,冷酷的现实是“全球化正在倒退”,“全球北方”和“全球南方”国家的发展不平衡加剧,资本主义体系内部也没有出现活跃的“反资本主义运动”。总体而言,技术霸权主义成为西方左翼理论界关注的核心命题,主要有以下三个原因。

(一) 西方左翼理论界的技术乐观主义幻想在现实中破灭

自2016年特朗普首次当选美国总统以来,西方左翼理论界的眼光从技术乐观主义转向技术霸权主义问题,开始研究技术的各种“返祖”现象。

一是冷战结束后世界格局的变化及“第三条道路”的技术维度想象。马克思曾指出:“资产阶级除非对生产工具,从而对生产关系,从而对全部社会关系不断地进行革命,否则就不能生存下去。”^③20世纪末,冷战结束后所谓的“和平红利”推动美国互联网和信息技术迅猛发展,社会交往范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西方左翼一度放弃了对生产关系和权力结构的关注,转而聚焦身份政治或后工业社会等议题。正如吉登斯所指出的:“社会关系从彼此互动的地域性关联中,从通过对不确定的时间的无限穿越而被重构的关联中‘脱离出来’。”^④奈格里(Antonio Negri)与哈特(Michael Hardt)等学者也认为,互联网技术将推动社会流动性和民主化发展。^⑤一方面,奥巴马在任时期,社交网络被西方左翼视为民主、解放和反体制的重要工具,如在“占领华尔街”运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另一方面,以互联网为核心发展的各项新技术也一度被寄予厚望。在加州意识形态(Californian Ideology)和新熊彼特主义经济学(Neo-Schumpeterian Economics)的融合下,新左派个体解放精神的延续与市场万能论和技术决定论相结合,催生了所谓的“电子的雅典式民主”(Electronic Athenian Democracy)。不仅如此,初期的数字技术和平台资本通过话语被包装为去中介化、自由的发声平台,其在早期非技术垄断地位下展现出来的先锋和进步势头也具有迷惑性,这使得西方左翼对技术进步抱有乐观预期。只可惜随着技术发展,“创造性”赋予资本动力,“破坏”则留给了大众。

二是2016年美国大选期间平台资本的信息操纵和技术介入。21世纪第一个十年之后,大数据算法迅猛发展。2009年,谷歌推出大规模图计算系统“普雷格尔”(Pregel)。作为分布式图处理框架,其极大加强了数据处理和计算能力。此时,西方左翼虽已初步关注数据驱动算法、广告等问题,但尚未形成统一认识。剑桥分析公司被曝出非法获取并利用 Facebook

用户数据定向投放政治广告以干预选举，暴露出数字技术与平台资本对舆论风向的暗箱操作。直到2016年美国大选，多家技术巨头与美国政府形成了实质上的“合作关系”，西方左翼看到了技术可能成为动员和操纵“民粹”的强大工具，从而开始关注技术霸权主义，反思技术乐观主义。

三是技术乌托邦主义的幻灭及数字技术、平台资本运作下资本主义的控制现实。2017年，谷歌、推特等平台资本多次受到美国国会质询。美国国会举行了多次听证会并推进相关立法工作，^①使得数据滥用、隐私泄露及算法操纵等问题一时间成为世界舆论的焦点。此外，谷歌和亚马逊等开始参与军事合作及社会管控，如2017年的“Maven项目”以及美国对其他国家进行的“技术制裁”。美国《2019财年国防授权法案》等相关政策的推行，让西方左翼开始认识到数字技术和平台资本背后隐藏着技术民族主义和保守主义底色。2018年欧盟《通用数据保护条例》(GDPR)正式生效，标志着围绕数据权力的平台治理博弈逐渐拉开帷幕。此后，美国平台资本大量垄断了社交、教育、金融等各个领域，多位西方左翼理论家接连发表技术乐观主义幻灭的言论和宣言。

(二) 新技术与金融资本结合

数字技术、智能制造等新技术出现后，金融资本找到了新的吸附对象和扩张领域，从而推动了平台资本的诞生。平台资本又与金融资本共谋攫取利润。于是，西方左翼理论界发现新技术与金融资本结合后日益成为阻滞社会进步的霸权力量。

在平台资本的早期发展阶段，金融资本主要通过风险投资，以股权、融资、孵化等手段为初创的平台资本提供较为充裕的基础资金。“在初期阶段，投资者热切地加入，希望选择最终的赢家。”^②例如，谷歌1998年获得安迪·贝托尔斯海姆(Andy Bechtolsheim)10万美元天使投资，一年后又获得凯鹏华盈(Kleiner Perkins)及红杉资本(Sequoia Capital)2500万美元投资，^③有力推动了其新技术的快速迭代，使其迅速实现平台的商业化转型。

当平台资本运作后，金融资本利用自身流动性的优势，通过整合全球性资源为平台资本的跨国垄断以及各类基础节点的全球性布局提供支撑。首当其冲的就是金融资本直接支持平台资本扩张数据中心和数据服务覆盖的基础设施资源。例如，Facebook在2008年获得风险债务融资公司(TriplePoint Capital)1亿美元贷款，在全球范围内布置数据中心网点。^④不仅如此，金融资本会为平台资本提供财务咨询、市场分析、风险评估的软资源，以及金融关系和人才储备等硬资源。例如，Facebook在2014年以190亿美元收购即时通信应用WhatsApp时，除了通过发行股票等方式作为对价的一部分外，摩根士丹利还为卖方提供了估值、尽职调查以及帮助构建整体交易结构等相关服务。

当平台资本开始稳定盈利后，金融资本开始推动平台进行剥削逻辑的转换和金融风险的转嫁。一方面，金融资本的逐利本性驱使平台资本不断加码流量要求和业绩需要，各项算法体系对平台劳动者的生活、工作等各细节进行高度计划和自动化分配。劳动越来越碎片化、不稳定化，平台劳动者对自身生活和劳动过程的控制权逐渐丧失。另一方面，平台资本的金融逻辑创造了技术风险的转嫁机制，平台通过数字技术动态调整价格、单量等各要素，将市场波动、市场需求变化、运营成本和商消冲突等外包转嫁给劳动者。此时，西方左翼理论界认为，平台资本就从变革的希望之星蜕变为新的异化之源、奴役之源。

(三) 世界一体化进程遭遇阻碍

随着技术的发展，西方左翼理论家发现，他们视为人类历史发展正确方向的世界一体化进程

① Hamza Shaban, Craig Timberg and Elizabeth Dwoskin, "Facebook, Google and Twitter Testified on Capitol Hill: Here's What They Said," *The Washington Post*, October 31, 2017.

② 尼克·斯尔尼塞克:《平台资本主义》，程水英译，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25页。

③ Todd A. Finkle, "Corporate Entrepreneurship and Innovation in Silicon Valley: The Case of Google, Inc.," *Entrepreneurship Theory and Practice*, vol. 36, no. 4, 2012, pp. 863-884.

④ Eric Auchard, "Facebook Takes \$100 mln in Debt As CTO Departs," *Reuters*, May 12, 2008.



正遭遇阻碍并出现一定程度的逆转，技术进步并未如预期般推动世界一体化的深入发展及人类的普遍交往，反而使人们的生产和交往关系沿着前现代的逻辑发展，变得更加封闭和保守。

一是西方左翼肯定的世界一体化理念正遭受技术霸权主义的冲击。自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对于新自由主义推动的全球化进程，西方左翼理论界总体上持批判态度，但在批判全球化过程中资本野蛮扩张和掠夺的同时，他们也承认全球化客观上推动了世界一体化，并且后者体现了人类未来发展的总体方向。美国无政府主义者大卫·格雷伯 (David Graeber) 强调，“反全球化运动”实际上是反对新自由主义，而非反对全球化本身。他主张，全球合作与人类的普遍联系是应对全球性生态、正义等问题的必要途径，必须在反对新自由主义“伪全球化”的基础上，建立更加平等、自由的全球秩序。^①法国经济学家皮凯蒂 (Thomas Piketty) 在《平等简史》中也指出，当前的全球化模式只会加强贫富差距，而这一问题可以通过财富税和基于“社会和生态双目标”的新型国际主义关系来解决。^②因此，在西方左翼理论界看来，技术霸权主义本质上是反世界一体化的，是在开“历史的倒车”，他们有责任与之抗争。

二是国家与金融资本、技术的同谋导致数字区域的分裂及数字主权的兴起。进入 21 世纪的首个十年，原初由美国私有企业主导、遵循共同协议标准 (如 TCP/IP 协议) 的互联网，开始丧失“全球公地”的原初地位，转而成为龙头企业控制的技术高地及国家安全与资源的核心场域。由“信息高速公路” (information superhighway) 搭建的数据密集型网络开始分崩离析。2019 年以来，美国主导的所谓“清洁网络” (clean network) 倡议及一系列制裁措施都意味着“网络地缘政治” (network geopolitics) 的深化，也标志着技术霸权主义下竞争的公开化和白热化。在此背景下，中国出于国家安全、信息自主控制等考虑，推动数字基础设施和云数据的本土化，并加强对平台资本的监管；欧洲则推出了“欧洲数据战略” (European Data Strategy)；俄罗斯、印度等国家也出台数据安全法律法规，共同标志着数字主权的兴起。此外，国际互联网技术组织的话语权争夺愈发政治化，平台资本针对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差异化运营政策，也使得各区域所处的“数字世界”日益不同。

三是发展中国家面临数字依附与数字殖民的困境。在帝国主义时代列宁曾指出，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殖民主要集中在金融资本主导下的殖民地化和经济控制领域。而在当代社会，受美国技术霸权主义的影响，数字秩序持续动荡，发展中国家逐渐形成了数字依附和数字殖民地的局面。一方面，这些国家的基础设施、云服务重度依赖跨国头部技术企业，如亚马逊、微软、谷歌等。数据显示，截至 2024 年，非洲仅有 100 多个数据中心，^③截至 2025 年 4 月，其总容量仍不足全球总量的 1%。^④另一方面，发展中国家只能作为数据矿藏地，在数据主权和数据治理方面缺乏话语权，大量重要的本土数据被头部技术企业无限制采集，并运输至发达国家用作人工智能训练或其他数据分析。例如，尼日利亚、肯尼亚等国的移动支付平台及数字健康平台背后都有美国企业的身影。

技术霸权主义的五种“返祖”现象

从“技术民族主义”和“技术封建主义”的批判视角出发，我们可以发现技术霸权主义呈现出五种“返祖”现象。

一是从自由流动向“数字圈地”的“返祖”。新自由主义主张各种生产要素不受限制地自由流动，

① David Graeber, "The New Anarchists," *New Left Review*, no. 13, 2002, pp. 61-73.

② Thomas Piketty, *A Brief History of Equality*,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22, p.26, p.219.

③ Samuel Carvalho, "Data Centers-Just One Part of the African Digital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Equation," *Data Center Dynamics*, June 4, 2024.

④ "World Bank Backs Africa Digital Data Push with \$100 Million Raxio Deal," *Reuters*, April 3, 2025.

以实现资本利润的最大化。在数字化时代，数据已成为基础性生产资源，对数据资源的争夺已成为企业与企业、国家与国家之间竞争的焦点。在美国，头部数字平台企业利用技术优势，生产、攫取并占有海量数据，在构筑全球数字化平台生态圈的同时，进行“数字圈地”：它们构建多平台体系和配套终端体系，不断扩大注册用户数量，通过收集、处理与分析用户数据，形成自己的“数据领地”；利用算法精确测量和提取用户数据创造的价值，并进行隐性、独占性的利用，构筑起“数字围栏”；与国家权力共谋，以立法的方式禁止或限制本国重点领域、重要行业敏感数据的流动，但宣称对本国企业在其他国家生成的数据拥有长臂管辖权，实施“数字殖民”。可以说，美国头部数字平台企业正是通过限制数据这一生产资料的自由流动，形成了新的数据垄断，实现了财富的惊人增殖。根据道琼斯市场数据，2025年2月中旬，美国“科技七巨头”总市值达到17.5万亿美元，超过日本、德国、英国和印度四国股市市值的总和。

二是从攫取利润向收取“数字地租”的“返祖”。在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劳动者创造的剩余价值是资本利润的主要源泉。新自由主义时代，金融服务业成为大赢家，其利润主要还是在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形成的。在数字化时代，数字技术推动基于知识产权、品牌、专利、数据等无形资产的垄断，改变了全球价值链的形态：设计与研发、销售与服务环节能够获得更多的利润，而生产环节的利润则在不断减少。今天，美国的商业资本不得不依附头部数字平台企业的云平台开展商业活动，要生存下去就必须给这些云平台缴纳云地租。例如，App Store对一般应用及应用内购买抽取30%的标准佣金作为“苹果税”，对订阅满一年的内容也收取15%的佣金。^①这种基于无形资产的垄断，使得极少数头部数字平台企业能够通过“数字地租”获得更多收益。

三是从平等自由主体向“数字依附”的“返祖”。正如马克思所揭示的那样，资本主义生产过程要求人们成为平等自由的主体。“如果说经济形式，交换，确立了主体之间的全面平等，那么内容，即促使人们去进行交换的个人材料和物质材料，则确立了自由。”^②“流通中发展起来的交换价值过程，不但尊重自由和平等，而且自由和平等是它的产物；它是自由和平等的现实基础。”^③尽管这种平等自由主体仅是形式上的，但较之于前资本主义时代人对人的依附关系，无疑是一种历史进步。在数字化时代，头部平台企业通过算法治理，对“数字领地”内的用户进行自动化管理，剥夺了用户反思和挑战现实的能力，使得数据生产者与平台之间形成一种类似封建时代人身依附关系的“数字依附”。拥有平台的科技巨头通过占有用户生产的数据获得经济收益，并实现对用户社会交往的控制。

四是从市场化向国家干预的“返祖”。新自由主义推崇全面市场化，认为市场经济是实现资源合理配置的最佳制度。在技术优势显著时，美国曾标榜“科学无国界”，支持技术要素的全球自由流动。但随着中国科技的迅猛崛起，美国的技术引领地位受到严重挑战，转而诉诸国家干预以维护技术霸权：对外，通过立法和多边联盟切断高新技术及其产品向中国的自由流动，运用知识产权保护遏制中国企业，推动与中国科技交流的脱钩，限制中国学者进入可能影响美国技术霸权的科技领域；对内，通过制定国家产业政策、加强国家投资、抢夺全球技术治理标准设定权等方式，大力支持美国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

五是从全球市场向平行市场的“返祖”。新自由主义兴起后，美国和西方致力于推动经济全球化，努力打造美国和西方主导的全球市场，并取得显著成效。以至于在20世纪90年代末，人们常引用《共产党宣言》中那句名言：“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

① Stephen Nellis, “Apple Lowers App Store Fees for Small Developers, Critics See Little Impact,” *Reuters*, November 18, 2020.

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197页。

③《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477页。

①②《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第35页，第592页。

③《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46页。

④《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940页。

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①但近年来，为了遏制中国的科技创新，美国以保护供应链的韧性、多样性和安全性为名，试图构建一个由美国主导、“去中国化”的科技创新供应链，其实质就是在既有全球市场之外构建一个平行市场。

正确认识技术霸权主义的“返祖”现象

自然界的“返祖”现象并不一定意味着退化，技术霸权主义的“返祖”也绝非西方左翼理论界希冀的那样，意味着“数字资本主义”被前资本主义因素“杀死”了。事实上，这是金融资本渗透产业资本，在当下条件下寻求增殖最大化的功能性重组。

（一）技术霸权主义是旧的生产关系的残篇重构

历史发展是一个延续的过程而非突然的“断裂”，旧生产关系的残余会残留在新的生产方式之中。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②在新的社会生产形式尚未成熟时，旧的生产关系仍会发挥效用。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人类生产方式的最晚近形态，是借助之前的生产方式的“残片和因素”建立起来的全新构造。过去的“残片和因素”，既有可能作为“还未克服的遗物，继续在这里存留着”，^③也可能被重组进新构造中得到更为充分的发展。在这里，起决定作用的还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运动。

其一，美国技术霸权主义呈现的种种“返祖”现象，本质上是过去的“残片和因素”在新构造中的重新功能化。而封建的、过去的残片和因素，其旧的生产关系主要包含着“三位一体”的结构，即“等级性的权力关系”“资源的排他性占有”以及“强制性的掠夺性剥削”。这些因素在当代的数字技术、平台资本、智能制造等技术加持下重新组织成新的形式。一方面，就“等级性的权力关系”来说，当下数字技术标准、协议已构成新的等级体制。除国家主导的最高级中心标准制定之外，大型平台作为地方和世界“诸侯”，也各自推行其技术标准，开发者及用户只能在其体系内活动，形成类似封建契约性、等级性的效果。另一方面，就“资源的排他性占有”来说，知识产权制度使创新成果拥有了封建土地、领地一般的排他性质。如高通芯片公司通过“高通税”构筑垄断壁垒。数据在平台之间的不互通性质，也相当于执行领地性封锁的功能。此外，数字平台的监控以及各类数据流量的收集，将传统封建社会的简单人身依附及税务的征收升华为对用户行为和个体的全面控制和价值掠夺。肖莎娜·祖博夫(Shoshana Zuboff)称之为行为剩余(behavioral surplus)的榨取，即用户的日常操作都成为行为剩余的原料。当下“资本先生”和大数据、算法形成联盟，而“土地太太”则变成了云土地和知识产权围墙。^④技术标准、知识产权及数字控制重新功能化了封建的三要素结构，造就新的数字等级机制、云领地和租税掠夺性剥削。资本为了维持对这些新质生产力的绝对控制，诉诸更加原始、直接、暴力的积累及统治形式。

其二，绝不能因为看起来相似而将它们与过去的存在等同。正如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关系下嵌入商品经济和剩余价值交换体系的地租具有三种形态(绝对地租、级差地租、垄断地租)一样，历史的发展决不会简单重复过去。每一历史阶段对前一阶段的复现，往往是结构性变形与功能重塑。当下资本中残留的封建性权力和依附机制，在新技术作用下被资本逻辑重新塑形、嵌入市场中的交换、流通及剥夺体系之中。这种所谓的“返祖”现象，并非土地、血缘及人身依附

关系的复活，而是资本对数据收集分析、技术标准、平台规则的嵌套和运用，它服务于全球性的金融资本积累和技术霸权秩序。一方面，平台经济中的用户、资源、数据的依附关系不同于传统社会的权力依附。以往依靠血缘、地域发展的封建依附，变成了以算法、数据和网络等级地位为基础的技术性依附。另一方面，现代的技术性依附可以租赁、转让和买卖。换言之，数字地租、数字身份可以通过风险投资、价值变现在全球市场之中流动，这与传统土地地租、固定性身份有本质的差异。此外，当下的技术封建残篇本质上是全球金融资本重新整合的新治理方式，完全脱离了区域化、个人化、固定化的特质。数字技术中的专利、特殊协议和标准看似保守，实则“弹性十足”，能根据策略利用网络瞬时实现跨国的拓展及收缩，其本质是服务于金融资本的增殖。

其三，这一功能重组成为美国技术霸权主义合法性、正当性的意识形态凭证。统治秩序需要整合机制及正当性资源。进入现代社会以来，社会流动性迅猛发展，原子化、个体化趋势显著，原来由民族国家、社会福利体系、宗族等提供的集体整合性与保护功能逐渐减弱。正如波兰尼指出的，“这些市场的运行有毁灭社会的危险，所以共同体的自我保存措施便建立起来了”，^①社会大转型时旧有的嵌入关系会被激活，成为现代性的“安全带”。数字技术、平台、金融资本正是通过数据围栏，构建起类似封建庇护机制的平台性依附结构，并用更具有现代性的“用户体验”“社区生态”等词语来粉饰，建立起平台的权威性和秩序性，实现技术霸权主义的“再生产”。

（二）技术霸权主义的本质是金融垄断资本利用技术优势维护霸权地位

技术霸权主义所呈现的种种“返祖”现象充分表明，资本唯利是图的本性丝毫没有改变。只要有利益可图，就会将残留在自身中的各种过去的、野蛮的“残片和因素”重新释放出来，以实现利润最大化。自冷战后期到冷战结束，美国的技术霸权更多转向市场经济驱动的模式，此时硅谷也成为全球科技创新中心。以美国华尔街为代表的金融资本，通过对互联网、半导体、供应链等早期技术及21世纪以来的各类新技术，如数字平台、智能制造、人工智能等的大规模投资，进一步推动了金融资本和技术的深度融合。在此过程中，金融资本通过风险投资、并购等手段成为技术的实际控制者和推动者。总体来说，其作用体现在以下三个维度。

一是金融资本为应对危机推动技术发展走向特定的范式。一方面，金融资本当下正面临重大危机。正如《技术封建主义》作者迪朗在反驳“生产性动力仍占主导经济地位”的批评时所指出的，当下技术领域高投资具有“零和控制”的逻辑，即偏向控制性的而非生产性的，^②这实际上也从侧面印证了资本对技术的控制。但他没有说明的是，当下美国选择推动技术范式走向掠夺性及展现出来的各种“返祖”现象，本质上是应对资本主义周期性危机的结果。数字技术以及平台资本并非“生即为恶”，其在诞生之初也有过积极的一面，如亚马逊、优步等平台初期通过整合信息流显著降低交易成本，推动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及行业智能化，催生了各种灵活就业形态，推动全球化发展。而当技术发展进入竞争激烈的“红海”阶段，一般利润率下降且前景不明朗时，资本自然转向掠夺性、保守性的一面；当新技术发展到一定规模，资本又会重振生产性投资和利润剥削逻辑。另一方面，正如前文指出的，金融资本在由美国主导的技术创新的逻辑中，造就特定技术范式。具体来说，金融资本不仅为技术发展提供必要的资金，还通过各类金融手段或者技术手段，比如投资、产业政策及对金融市场偏好的控制，从宏观上选择性地推动特定技术应用及发展路径。比如，美国大型风投机构及私募基金持续

① 卡尔·波兰尼：《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起源》，冯钢、刘阳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171页。
② 赵丁琪：“技术封建主义”的内涵、争议与应对——访法国经济学家塞德里克·迪朗》，《世界社会主义研究》2025年第3期。



注资谷歌、亚马逊、微软等平台企业，并且通过首次公开募股（IPO）和并购等方式制造行业风口，控制技术范式，最终形成技术和资本之间的同谋关系，共同维护美国的技术霸权。此外，当下金融资本推动各类平台技术范式走向垄断和集中。面对全球利润率下滑，新自由主义之后的金融主导的短期主义更青睐“脱实向虚”的价值创造体系，并要求快回报、快退出的机制，通过金融投机、对冲基金、并购重组、债务杠杆等方式攫取利润。在机构投资者和风险资本的双重压力下，金融资本秉持“幂律效应”（power law）原则，更钟情于科技巨头的独角兽及封建和垄断的路径。例如，在 OpenAI 的崛起中，微软投入的约 100 亿美元估值就迅速超过千亿美元。

二是结构性要素与金融的流动性要素相结合，重构了金融资本的积累模式。金融资本有脱实向虚的本质追求，而网络平台的各类资产，如数据流量、用户网络等，这些都是非实体的形态，主要以用户依附、算法权力等无形的状态出现，并且金融资本的信用体系也被数据归纳、算法推演为增长预期、用户规模、数据控制力等，这些更加容易被资本证券化，进而被包装为金融商品，通过融资、股权并购等手段进行交易，使得价值链分配和资本积累结构都发生重大变化。另一方面，金融资本通过技术泡沫实现周期性重组、扩张和发展。通过舆论造势和宣传神话，金融资本缔造了元宇宙投资热、区块链狂热等技术话题和所谓“增长点”。这些便于传播、创造声势的技术领域经常会导致泡沫膨胀，甚至是周期性破裂，而破裂后金融资本可以低价收购相关技术和资产，“创新—投机—泡沫—重组”的循环进一步强化了金融资本的增殖路径。此外，金融资本更是利用大数据、算法等技术来展开“预测性治理”机制。掌握数据就是掌握了未来，通过算法的预测及推演资本市场和技术产业发展的各项趋势，金融资本能更有效地规避、干预和操纵市场中的不确定性和技术风险。例如，硅谷创投机构（安德森·霍洛维茨基金等）利用技术预测模型预先发掘并引导新兴技术趋势（如 Web3.0、AI 产业），早早布局。这是封建主义时期达不到的、前所未有的资本治理和增殖范式。

三是金融资本与技术的深度融合造成了技术霸权主义的结构性耦合与全球性霸权。一方面，美国的平台资本与技术巨头不仅是技术创新企业，更是融合了金融资本和高新技术的复合型集体。如苹果投入超 2000 亿美元现金资产进行资本运作，亚马逊、微软等巨头也用股票、期权等方式激励人才。另一方面，美国金融技术的科技复合体“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广泛参与人工智能、云计算等各类平台标准的制定，在国际标准化组织（ISO）、电气电子工程师学会（IEEE）、万维网联盟（W3C）等组织中占据主导地位。美国还频繁通过《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TRIPS）和《1974 年贸易法》第 301 条款等政治手段对中国、印度、欧盟等国家和地区施压。通过标准制定和产业链全球化，金融资本、数字技术和平台资本结合形成了一种新型帝国主义，建立分层控制的租金抽取机制。如数据显示，高通（Qualcomm）2025 年第二季度的专利许可业务收入预计约 13.5 亿美元。^①发达国家掌控技术研发、标准制定，而发展中国家被技术遏制，锁定低端制造以及原材料出口等环节，金融资本通过制度性壁垒和自身的流动性在全球范围内攫取剩余价值。此外，金融资本推动美国技术治理范式的全球扩张。例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等机构长期以“技术援助”“普惠互利”等为由，推动其他国家接受美国式的治理范式；美国国务院开启所谓“网络自由计划”（NetFreedom Task Force）。这些技术援助经常会和贷款政策、结构调整等捆绑起来，在打开其他国家数字市场的同时，塑造数字经济和技术的基础格局，进一步巩固技术霸权。

① Stephen Nellis and Arsheeya Bajwa, “Qualcomm Sales Beat Estimates, Shares Drop after Licensing Forecast,” *Reuters*, February 5, 2025.

(三) 技术霸权主义内部的虚弱和空心化

早在 19 世纪工业革命时期，美国就已经经历了技术创新与资本扩张逻辑的博弈。在当时，面对铁路、石油、钢铁等基础产业的飞速发展，铁路巨头范德比尔特 (Cornelius Vanderbilt) 等被爆出用价格战、回扣等灰色手段排挤竞争者。美国政府为了保护技术创新，也干预打击垄断，先后于 1887 年通过《州际商业法》(Interstate Commerce Act)、1890 年通过《谢尔曼反托拉斯法》(Sherman Antitrust Act)。可见，在资本早期扩张阶段，美国技术创新的逻辑一定程度上占据上风。但如今金融资本不惜铤而走险，形势已然发生逆转，这也证明了美国技术霸权主义内部的虚弱和空心化。

其一，从技术发展内在逻辑来说，技术发展自然具有创新开放的内在维度。一方面，技术的发展本身就建立在前人知识的地基和跨专业交流之上。马克思曾深刻指出：“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①技术和知识在诞生之初本身就是非排他性的，在现代社会，一项复杂的技术也需要社会各领域共同参与，不断打磨，才能更好地带来市场效益，找到创新点。另一方面，现代技术的创新发展路径重点在于开放性。进入工业社会之后，技术系统要求标准化、模块化生产和设计，以促成不同组件平台间的耦合性和互操作性，这实际上就是内在要求在开放中创新、发展。比如，从软件上来说，互联网的核心协议（如 TCP/IP）需要通过开放协作来共同制定，以确保全球网络的兼容互通；而从硬件上来说，模块化的接口的公开性，也方便了第三方开发和兼容性的部件。比如 IBM 在 1981 年推出型号为 5150 的个人电脑之时就采用了开放性的模块化设计，随后数年，康柏 (Compaq)、戴尔 (Dell) 等公司推出兼容的个人电脑，大量第三方组件厂商接连涌现。^②“Wintel”主导的技术生态更加丰富，技术共同体得以形成。此外，技术创新和开放能够推动技术民主化，打破技术霸权。芬伯格 (Andrew Feenberg) 认为，技术的使用权、控制权等各项权力并非被资本和统治阶级垄断，而是具有社会可塑性。技术创新和开放也会吸引大众参与，大众的技术实践会使得其更具有发言权和影响力，通过技术代码 (technical code) 的社会展开方式，技术也有可能沿着去中心化、赋权于民的方向发展。^③

其二，技术垄断牟利的资本扩张逻辑经常会阻碍技术的发展，时常出现博弈。一是知识产权的滥用。专利制度本身是为了激励技术创新，但在技术实践中，技术巨头公司及技术投机者会利用专利壁垒抑制技术创新，攫取市场利润。如美国存在大量的“专利流氓” (patent trolls) 公司，它们不进行技术的研发创新，仅以宽泛的专利向技术创新者索赔。二是资本通过收编或扼杀手段应对影响其扩张的技术创新。不同于前面论述的金融资本在宏观技术范式上的投资和金融市场偏好推动，面对各项技术创新，资本会结合技术采取更具体的应对手段。一种模式是资本可以通过更加强大的平台、生态体系和标准化的协议来强制外在创新技术融入自身之中；而另一种暴力的手段则是有了—定声量和体量的技术创新都会被资本收购、雪藏或者打压，这被称作“创新禁区” (kill zone)。比如，Facebook (现 Meta) 在过去十多年里，就收购了数十家初创公司，包括赫赫有名的 Instagram 和 WhatsApp，收购前者的原因是竞争不过，对后者则是收购后控制 (buy-to-control)，目的是预先消除新兴社交平台的可能威胁。Facebook 的一连串行为也被指控为“多年系统性反竞争”。此外，资本扩张逻辑造成追求效益的迫切性。正如有些技术发展必须等待时机，北美技术批判理论学者莱斯 (William Leiss) 曾指出，技术发展的长期性和当下的效应，经常是大

①《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2 卷，第 470—471 页。

② Carliss Y. Baldwin, *Design Rules, Volume 2: How Technology Shapes Organizations*, Cambridge, MA: MIT Press, 2024, p. 245.

③ 安德鲁·芬伯格：《技术批判理论》，韩连庆、曹观法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年，第 176 页。

① William Leiss and Christina Chociolko, *Risk and Responsibility*, Montreal & Kingston: McGill-Queen's University Press, 1994, pp.257-258.

② Daron Acemoglu, "A Sputnik Moment for AI?" *Project Syndicate*, February 4, 2025.

众所不能理解的问题。资本扩张下的技术发展趋向于更加现实的经济利益，风险被推到未来和其他领域，而需要时间证明的技术创新则更多被市场忽略。^①事实上，除了“风口项目”之外，大量基础性的技术创新研究（如材料学等）增长乏力。

其三，创新与垄断的结构性矛盾会持续加剧技术霸权的脆弱性与冲突。一方面，技术霸权下技术内在创新动能会衰竭。大型科技巨头企业在市场上占据垄断地位后，会走向僵化和流程臃肿。开发人员和技术人员受到官僚化绩效和考核体系影响，难以孵化创意的同时，可能的创新路径也会被反复审批、考量，变得单一化。此时，创新开放的思维也就变成了如何维持当下技术霸权、防御外部的技术挑战。202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美国经济学家达龙·阿西莫格鲁（Daron Acemoglu）指出，美国人工智能产业存在集体思维的逻辑误区，过于强调规模性的技术模型，却忽视了更低成本、更高效的可能替代方案，^②这种技术自腐蚀的状态会导致企业雪藏创新团队，依赖传统技术路径，造成创新链条断裂和极致内卷化的局面。另一方面，全球技术创新体系通过去中心化、重视技术安全应对技术霸权主义。面对技术霸权主义的强硬局面，全球范围内去金融平台化及技术创新格局多极化的历史趋势正在不断发展。这不仅是因为技术霸权的冲击和压迫，使得各个民族国家体认到技术领域自主性和数据主权性的重要性，从而出台更具针对性的技术治理、发展策略。比如，欧盟数字主权（Digital Sovereignty）战略及《通用数据保护条例》（GDPR）对自主数据安全的重视；中国则进一步加快人工智能、量子计算、云服务等技术领域的内循环布局，构建具有可控性、不依赖美国技术体系的技术生态。新技术的发展也使各个国家得以抓住发展智能制造和数字技术转型的历史性机遇，通过跨区域合作，推动全球技术生态的去中心化和多元化。此外，在技术霸权主义极强的壁垒和控制之下是高度的内爆风险。“返祖”现象的存在意味着资本扩张逻辑占据了主导地位，客观上压制了技术的持续创新。金融资本通过高度垄断、集中性以及短视逐利的技术导向，短时间内的确能够控制流量和市场，建立起极强的技术云领地，攫取高额的技术租金。但这一机制的内在本质是创新开放的空心化及衰弱化，美国技术霸权主义或将从其最薄弱的某个环节开始发生断裂乃至内爆。而此时处于创新堡垒和技术保护主义下的美国，不仅难以维持技术上的先锋地位，而且技术内爆会发生外溢，引发全球性技术产业链变化和创新高地转移。

总之，技术霸权主义的“返祖”特性是资本为了适应时代变化而利用新技术和旧要素的体现，正如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指出的，即使在更高级的社会形态内，还会残存“带着旧社会胎记”的缺陷，就算在最现代的数字技术和平台经济之中，也会有生产关系发展滞后于生产力的前社会形态的残余，这种“旧瓶装新酒”的方式也表明了数字技术和平台资本、智能制造发展的当下阶段，资本并没有形成稳定的生产关系来驾驭新质生产力，这种直接的、显性的、“返祖”的暴力掠夺、剥夺方式，正是其结构劣质性和低效性的证明，也为未来的技术变革、国际格局变迁埋下伏笔。

编辑 张 蕾